

信任：父母的代内相似和亲子的代际传递*

池丽萍

(中华女子学院儿童发展与教育学院, 北京 100101)

摘要 以往研究指出, 信任有其家庭根源。以 116 个家庭中的子女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考察在家庭中, 父母信任水平是否相似, 父母和子女之间是否存在人际信任的代际传递现象。研究采用投资博弈问卷分别测量了子女和父母的信任水平, 并以送出数量和估计返还数量作为信任的测量指标。结果发现: (1) 子女和父母在投资博弈中均表现出一定水平的信任, 且父母的信任表现出相似性; (2) 在估计返还数量上, 信任表现出代际传递, 且传递存在性别差异: 父亲和母亲的信任水平不能预测女孩的信任水平, 能预测男孩信任水平; 父亲对男孩的影响呈 J 型曲线, 母亲与男孩的信任水平呈倒 U 型曲线关系。

关键词 信任; 代内相似; 代际传递; 投资博弈

分类号 B849; C91

1 问题提出

信任是个体间进行交往时, 交往双方存在的一种互相支持的行为和信念(Ben-Ner & Halldorsson, 2010)。这种信念让个体相信他人不会利用自己的弱点获益, 从而敢于在交往中作出可能遭受损失的行为。信任在经济发展和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被看作复杂社会系统的润滑剂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Calderon, Chong, & Galindo, 2002; 福山, 2001)。Knack 和 Keefer (1997)对 29 个市场经济体的研究显示, 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每提高 1 个标准差就会带来 1.15% 的经济增长。因此, 如何建立并提高人际信任就成了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多个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社会学者用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宏观社会变量来解释各国公民信任水平的差异和变化(马得勇, 2008; 辛自强和周正, 2012); 心理学研究者则从微观层面上关注个体的信任从哪里来(Corriveau et al., 2009)。国外有关信任的研究已表明个体的信任水平受父母信任水平的影响。例如, 尼米-詹宁斯社会化研究(the Niemi-Jennings socialization study)对美国青少年及其父母信任水平的调查显示父母与子女的信任水

平存在关联: 如果父母是高信任者, 那么其子女相信陌生人的可能性就高出 9 个百分点; 父母较低水平的信任能预测其子女的低信任(Niemi, Katz, & Newman, 1980)。Rotenberg (1995)对加拿大 50 名小学生及其父母进行了问卷和实验研究, 结果也发现母亲的信任水平能够预测子女的人际信任。最近, 德国社会经济调查结果再次证实信任存在代际传递(Dohmen, Falk, Huffman, & Sunde, 2009, 2012)。

以往一些有关信任代际传递的研究还发现父亲和母亲在子女信任水平发展中的作用不同。1969 年, Katz 和 Rotter 对大学生及其父母人际信任的研究发现, 父亲的信任水平对儿子的影响更大, 对女儿的影响较小(仅达到边缘显著水平); 母亲对儿子和女儿信任水平的影响程度相似, 但高信任和低信任子女的母亲信任得分差异仅达到边缘显著水平。然而, 也有研究得出与此相反的结果。例如, Rotenberg (1995)的实验研究显示只有母亲的信任水平能够预测子女的信任, 父亲的信任水平对子女信任发展未产生影响。2009 年, 在德国一项大样本研究中, 父亲和母亲对子女的信任水平影响相似(Dohmen et al., 2009)。这些不一致的结果促使研究者思考父亲和母亲信任水平的关系: 两者相似还是

收稿日期: 2012-06-15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CSH046)。

通讯作者: 池丽萍, E-mail: lipingchi@sina.com

互补。然而,以往研究仅考察了父母对子女信任水平的影响,而未关注父亲和母亲信任水平之间的关系如何,没有将同一家庭中的父亲和母亲作为配对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所以,我们只能看到父亲或者母亲分别影响着子女的信任水平,但两者的影响是相互促进的还是彼此掣肘的却不得而知。家庭作为个体信任建立和发展的基础环境,不仅父母信任水平高低会影响子女的信任,父母信任水平的相似度更会影响父母信任传递给子女的程度。

综上,本研究拟同时测量家庭中父亲、母亲和子女的信任水平,通过检验以下三个假设来论述父母与子女信任水平之间的关系。

假设 1:在家庭中,信任存在代内相似现象,即父亲和母亲的信任水平存在显著相关。有关文化价值观代际传递的研究指出,如果个体选择了与自己社会态度相似的异性结为伴侣,那么,他(她)的态度传递给子女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即他(她)更可能培养出与自己相像的子女(Bisin & Verdier, 2000)。因此,个体更倾向于寻找与自己社会态度一致的配偶。当然,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态度不相似,甚至相反的配偶组成的家庭能够更好地应对环境的变化(Chiappori & Reny, 2006)。例如,当社会环境或劳动市场发生变化的时候,具备某种特质(如冒险偏好)的个体能更好地适应环境,那些在这一特质上差异越大的夫妻对变化的适应能力越强。相反,夫妻相似性高的家庭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则较弱。不过,Dohmen 等人(2012)的调查显示,无论是共同生活时间较长的老夫妻,还是新婚不久的夫妇都表现出相似的信任水平。在中国目前还没有研究专门探讨过这一问题,因此,我们的研究将以中国家庭为研究对象,考察家庭中信任是否存在代内相似现象。

假设 2:家庭中,信任存在代际传递现象,即父母的信任水平可以预测子女的信任水平。以往有关信任代际传递的研究,如美国社会学家对青少年及其父母的大规模追踪研究(Niemi et al., 1980)、美国心理学家对大学生及其父母的人际信任关系的考察(Katz & Rotter, 1969)、加拿大学者对父母及子女信任水平的实验研究(Rotenberg, 1995)、Dohmen 等人(2009, 2012)对大量德国家庭进行的信任博弈和调查研究,以及早期社会学者有关个体信任发展根源的访谈研究(尤斯拉纳, 2006)都表明子女的信任水平或多或少地受父母影响。尽管各项研究样本容量不同,被试年龄段各异,信任的测量方式及后续

的统计方法也不尽相同,最终得到的回归系数或其他表示代际信任关联程度的数值大小各异,但它们都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他们的社会文化中存在信任的代际传递现象。目前,我国缺乏针对这一主题的实证研究,我们还无法确认或否定信任存在代际传递现象这一假设。而对这一假设的检验无疑将为个体信任影响因素,尤其是家庭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所以,本研究将检验这一假设在中国家庭中是否成立。

假设 3:在信任传递过程中,父母所起作用的大小与子女性别有关。以往对父亲和母亲在信任代际传递过程中所起作用的研究得到的结果很不一致。早期信任研究发现,只有父亲的信任水平会影响子女信任,且父亲对儿子的影响较大,对女儿几乎没有影响(Katz & Rotter, 1969);但也有研究结果显示只有母亲的信任水平能够预测子女的信任(Rotenberg, 1995);而新近研究则表明父亲和母亲的信任水平都会对子女产生影响,只是在作用程度上稍有差异(Dohmen et al., 2009, 2012)。所以,信任代际传递过程中父亲和母亲谁的影响更大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2012 年,Zumbuehl, Dohmen 和 Pfann 提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越多,子女受父母的影响就越大,代际传递的效应就越强。这一假设已经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这就意味着那些受到父母较多关注,父母为之投入的时间、精力较多的子女更可能表现出与父母相似的态度和价值观,其信任水平更可能受到父母的影响。进化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子女性别会影响父亲的教育投入及影响力大小:父亲对儿子的教育投入大于女儿;而母亲则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差异(Li & Chang, 2007)。在此基础上,我们推论:男孩父亲的信任水平对子女信任水平的预测作用比女孩父亲更强,但母亲信任水平的预测作用则不因子女性别不同而表现出差异。

研究者通常用经济博弈实验测量信任。投资博弈便是广泛用于测量信任的博弈任务之一。在该博弈实验中,被试被随机分配为 A 和 B 两组,分别担任信任者和被信任者的角色,在整个博弈过程中双方互不见面。所有被试都拥有 S 元代币的初始资金。在博弈中,由信任者 A 来决定投资其初始资金中的 X ($0 \leq X \leq S$) 给匿名的被信任者 B, B 会获得 $3X$ 的收益。在 B 获得收益后决定如何分配其获得的收益——返还 Y ($0 \leq Y \leq 3X$) 给 A。A 和 B 的收益分别为 $S-X+Y$ 和 $S+3X-Y$ 。X 反映的即是 A 的信任水平,

Y 表示 B 的可信赖性。按照“经济人”的假设,由于没有任何惩罚和约束措施,理性被信任者收到送来的钱后,为了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然会选择不返还;而理性信任者在做送出决策时也会预计到被信任者的不返还行为,所以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不会送出一分钱,博弈会在(X, 0)点达到均衡。然而大量研究发现,信任者送出的金额往往介于 40% 到 60%之间,这表明个体对他人的信任是普遍存在的(郑璞, 俞国良, 郑友富, 2010)。有关投资博弈测量可靠性和有效性的研究表明,个体在投资博弈中的表现与其对他人可靠性的估计存在显著相关(Burks, Carpenter, & Verhoogen, 2003),且被试在博弈中的表现能预测其在实际生活中的行为(Dean, 2005)。可见,投资博弈是信任测量的较理想工具。本研究将采用投资博弈的范式,并结合被试年龄特征对博弈中的任务做出适当调整来测量儿童及其父母的信任水平,并检验家庭中父母的信任水平是否相似,父母的信任水平是否影响子女的信任水平,从而表现出信任的代际传递。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以家庭为取样单位,每个家庭中的父亲、母亲和一个未成年子女参与研究。研究在北京选取了 116 个家庭,其中,116 个儿童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9.92 岁,标准差为 1.24,包括 61 个男孩和 55 个女孩。所有儿童被试均来自双亲家庭,其父母构成本研究的成人被试,共 232 人。其中,父亲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41.40,标准差为 3.93;母亲的平均年龄为 38.96,标准差为 3.40。独立样本 *t* 检验表明男生和女生父亲和母亲的年龄不存在显著差异, $t(112)=0.09$, $t(113)=0.83$, $ps>0.05$ 。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分布情况为:高中及以下占 8.8%,大学占 69%,研究生占 22.1%;母亲的分布情况为:高中及以下为 6.9%,大学占 81.7%,研究生 11.3%。卡方独立性检验结果显示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水平未因子女性别不同而表现出差异, $\chi^2(2)=2.50$, $\chi^2(2)=0.74$, $ps>0.05$ 。父母职业大致可以分为自由职业、公司职员、公司管理人员、工程师、警察及军人、公务员、医生及教师等七类。父亲从事以上各类职业的人数百分比依次为 9.4%、30.2%、15.1%、8.5%、12.3%、16.0%和 8.5%;母亲从事各职业的人数百分比依次为 9.4%、50.0%、6.6%、0.9%、1.9%、11.4%和 19.8%。卡方独立性检验结果显示男孩和女孩家庭中父母

职业类型不存在显著差异, $\chi^2(6)=5.56$, $\chi^2(6)=3.29$, $ps>0.05$ 。

2.2 工具与方法

研究采用问卷形式呈现投资博弈任务。由于本研究中儿童被试年龄较小,其对金钱投资的理解和对 3 倍数量的计算能力可能影响研究结果,因此,我们对经典的投资博弈作了调整以适应儿童被试。首先,将原来博弈中的金钱投资改为儿童被试送出巧克力并估计被信任者返还多少;第二,将经典投资博弈中金钱变化的倍数由“3 倍”改为“2 倍”。具体博弈指导语如下:

“假设你和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叫 xx)各有 5 块巧克力。你可以选择把自己的巧克力送给这个陌生人 xx 一些,可以送 0 块,也可以送 1 块、2 块、3 块、4 块或者 5 块。你可以自由选择。当你决定送给 xx 时,你就把要送的巧克力放进一个“会复制”的盒子里,xx 从盒子里取出的巧克力将变成你送巧克力的 2 倍。在得到这些巧克力后,xx 会选择还给你一些。他最多可以把自己得到的所有巧克力(你送他巧克力的 2 倍)都还给你,最少可以还给你 0 块,也可以是 0 块和最多块数之间的任何数量。还你多少,由他决定。比如,你决定送 2 块巧克力给 xx,他将会得到 4 块,他可以选择返还给你 0 块、1 块、2 块、3 块或 4 块。具体能还你多少块巧克力由 xx 决定。”

然后呈现一道测试题目,询问当被试送出 3 块巧克力时,对方将获得几块,对方最多和最少可返还多少块巧克力。测试题目的目的是检测儿童被试是否理解博弈规则及其中的数量关系,以筛除无效被试。最后要求被试作出决定送出多少块巧克力,并估计对方会返还多少块。这是研究中被试信任水平的测量指标。

成人被试仍使用金钱博弈任务,但为了与儿童任务匹配,将金钱变化数量也由原来的 3 倍改为 2 倍。具体指导语为:

“现在,假设你和一个陌生人(我们称之为“XX”)各有 100 元人民币,你可以选择送一些钱给 XX,你所送的金额可以是 0 元,也可以是 1 元、2 元……,或者 100 元(具体送多少,你自己决定)。当你决定送 *n* 元人民币给 XX 时,他将会获得 2*n* 的金钱,也就是你送出钱数的 2 倍。在得到这些人民币后,XX 可能会选择返还给你一些钱,他可能会返还你 0 元、1 元、2 元……或者 200 元(返还多少,由 XX 决定)。例如,如果你决定送 70 元钱给 XX,他

将会得到 140 元，他可以选择返还给你 0 到 140 元间的任何数量的人民币，具体返还多少钱由 XX 决定。”

指导语后也分别提出检测问题和测量被试信任水平的问题。

3 结果与分析

3.1 儿童的信任水平分析

首先，对儿童在投资博弈中的表现进行描述。在送出数量上，没有被试送出 0 块，送出 2 块和 5 块的人数稍多，分别占总人数的 25.9%和 24.1%，但总体上送出数量分布较均匀；儿童平均送出 3.10 块，占其原有巧克力数量的 62.0%。在估计返还数量上，有 8.6%的儿童被试认为对方不会返还，认为对方返还数量在 5 块以上的人数也较少，仅占总人数的 8.5%，多数被试认为对方会返还 1 或 2 块(分别为 22.4%和 24.1%)，总体来看，被试估计对方返还的数量集中于返还 2 块以内。平均估计返还数量为 2.90 块，送出数量与估计返还数量的比值为 1:0.94，即儿童送出数量略多于估计返还数量。

然后，以儿童性别为分类变量，以送出和估计返还巧克力的数量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儿童在投资博弈中送出和估计对方返还的巧克力数量均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详见表 1。

第三步，分别以男孩和女孩为被试，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考察被试送出和估计返还巧克力的数量是否存在差异。检验结果显示，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其送出巧克力的数量和估计返还数量均存在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68 和 0.61，且送出和估计返还的数量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在投资博

弈中，儿童送出巧克力越多，估计对方返还的数量也越多。具体结果见表 1。

3.2 父母信任水平及相似性分析

首先，对父母送出、估计返还金额的频率进行统计。统计结果显示，7.8%的父亲送出 0 元，大部分(41.4%)父亲送出金额为 50 元，送出 30 元的占父亲被试总数的 12.9%，送出 100 元的占 24.1%；12.1%的父亲认为对方不会返还金钱，27.6%的父亲估计对方返还 50 元，各有 10%左右的父亲估计对方返还 30 元、100 元、150 元，5.2%的父亲认为对方会返还最高金额 200 元。选择其他金额的被试数量所占百分比都较低。父亲被试平均送出 51.98 元，占其原有资金的 52.0%，平均估计返还金额为 64.09 元，送出金额和估计返还金额的比例为 1:1.23。

对母亲被试的分析显示，8.6%的母亲送出 0 元，34.5%的母亲送出 50 元，送出 30 元和 100 元的分别占母亲总数的 10.3%和 27.6%；16.4%的母亲认为对方不会返还金钱，23.3%的母亲估计对方返还 50 元，15.5%的母亲估计对方返还 100 元，3.4%的母亲认为对方可能返还 200 元。选择其他金额的被试数量所占百分比都在 10%以下。母亲被试平均送出 54.38 元，占其原有资金的 54.4%，平均估计返还金额为 57.52 元，送出金额和估计返还金额的比例为 1:1.06。

然后，检验不同性别儿童的父母在投资博弈中的表现是否存在差异。以儿童性别为分类变量，以父母送出和估计返还金额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男孩和女孩父母在博弈中送出和估计返还的金额没有显著差异。表 2 描述了父母送出和估计返还金额的具体情况。

表 1 儿童送出和估计返还巧克力的数量及检验

被试分组	送出数量(<i>M</i> ± <i>SD</i>)	估计返还数量(<i>M</i> ± <i>SD</i>)	<i>r</i>	<i>t</i>
男孩(<i>n</i> =61)	3.00±1.45	2.95±2.38	0.68***	0.22
女孩(<i>n</i> =55)	3.22±1.37	2.84±2.23	0.61***	1.60
合计	3.10±1.41	2.90±2.30	0.64***	1.26
<i>t</i> (114)	0.83	0.79		

注：***表示 *p*<0.001。

表 2 父母送出金额和估计返还金额的描述(*M*±*SD*)

被试分组	父亲		母亲	
	送出金额	估计返还金额	送出金额	估计返还金额
男孩家庭(<i>n</i> =61)	49.74±31.20	58.18±50.19	56.75±32.16	62.41±52.81
女孩家庭(<i>n</i> =55)	54.47±33.23	70.64±60.32	51.75±33.21	52.09±46.06
合计	51.98±32.12	64.09±55.34	54.38±32.61	57.52±49.78
<i>t</i> (114)	0.79	1.21	0.83	1.12

表 3 父母送出金额与估计返还金额的比较

信任测量指标	<i>r</i>	<i>t</i>	送出-估计返还
男孩家庭(<i>n</i> =61)			
父亲送出与估计返还	0.86***	-2.35*	-8.44
母亲送出与估计返还	0.77***	-1.28	-5.66
女孩家庭(<i>n</i> =55)			
父亲送出与估计返还	0.85***	-3.29**	-16.16
母亲送出与估计返还	0.60***	-0.07	-0.35

注：*表示 $p<0.05$ ，**表示 $p<0.01$ ，***表示 $p<0.001$ ，下表同。

表 4 父亲和母亲信任水平的比较

信任测量指标	<i>r</i>	<i>t</i>	父亲-母亲
男孩家庭(<i>n</i> =61)			
送出金额	0.30*	1.46	-7.02
估计返还金额	0.17	0.50	-4.23
女孩家庭(<i>n</i> =55)			
送出金额	0.62***	0.70	2.73
估计返还金额	0.50***	2.51*	18.55

第三步，考察投资博弈中，成人被试的送出金额和估计返还金额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分别以男孩父母和女孩父母为被试，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考察父母送出和估计返还金额是否存在差异。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父亲和母亲在博弈中送出和估计返还的金额之间存在较高正相关，但父亲估计返还的金额显著高于其送出金额，母亲则未表现出这种差异。

最后，考察父亲和母亲在投资博弈中的表现是否存在关联和差异。分别以男孩父母和女孩父母为被试，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考察父亲和母亲在送出和估计返还金额上是否存在角色差异，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除了男孩父亲和母亲在估计返还金额上不存在相关外，父亲和母亲在其他变量上都呈现出显著正相关，且女孩父母的相关系数略高于男孩父母。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女孩父亲在博弈中估计返还的金额显著高于母亲。这说明在投资博弈中，女孩的父亲和母亲表现出相似的信任水平，而男孩的父亲和母亲只在送出金额上存在相关，两者在估计返还金额上没有关联。

3.3 信任的代际传递分析

首先，分别检验父亲、母亲与子女信任水平是否存在关联。以男孩家庭为分析对象，采用相关分析考查父亲、母亲和子女在博弈任务中的表现是否存在显著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在送出数量(和金额)上，男孩与父亲和母亲在相应变量上的得分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 $r(59)=0.15, 0.18, ps>0.05$ ；在估计

返还数量(和金额)上，男孩与父母在相应变量上的得分存在显著正相关， $r(59)=0.41, 0.27, ps<0.05$ 。以女孩家庭为分析对象，同样对子女与父亲、母亲在两个信任变量上的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女孩的信任水平与父母信任水平不存在显著相关， $r(53)=0.00, 0.03, 0.05$ 和 $-0.12, ps>0.05$ 。以上结果说明男孩和女孩父母对子女信任水平的影响不同，并且女孩父母的信任水平似乎不能预测子女的信任水平，男孩父母送出金额也不能预测子女送出巧克力的数量，仅父母估计返还金额能够预测男孩估计对方返还数量。

然后，采用散点图检验父母信任水平与子女信任水平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以排除相关分析对数据的误判。散点图显示女孩与父亲、母亲在送出数量(和金额)和估计返还数量(和金额)两变量之间都未表现出明显的线性和非线性趋势。这说明父母的信任水平不能预测女孩的信任水平。

以男孩家庭为分析对象，描绘父母和子女在送出数量(和金额)上的散点图，结果显示两变量未表现出明显的线性和非线性趋势。相关分析显示男孩父母估计返还金额与子女估计返还数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因此下面将以回归分析检验这一信任变量是否存在代际传递。以父亲估计返还金额为自变量，以男孩估计返还数量为因变量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模型显著，自变量对因变量变异的解释率为 17%。而后，以同样方法检验母亲估计返还金额是否能够预测男孩估计返还数量，结果表明该预测模型显著，模型解释率为 7%，模型具体指标见表 5。由于散点图显示父母估计返还金额与子女估计返还数量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因此采用曲线估计检验非线性模型与数据的拟和程度。结果显示数据与二次非线性模型拟和较好，具体统计指标见表 5。在表 5 中，无论自变量是父亲还是母亲的估计返还金额，二次非线性模型对数据的拟和程度均优于一次线性模型，二次模型的解释率比

表 5 父母估计返还金额对男孩估计返还数量的回归分析

回归模型及相应自变量	父亲				母亲			
	R^2	F	β	t	R^2	F	β	t
一次线性模型	0.17	11.75**			0.07	4.44*		
估计返还金额			0.41	3.43**			0.27	2.11*
二次非线性模型	0.27	10.84***			0.16	5.56**		
估计返还金额			-0.48	1.47			1.07	3.12**
估计返还金额的二次方			0.94	2.91**			-0.86	2.51*

一次线性模型提高了近 10%。模型显示父亲和母亲估计返还金额对男孩估计返还数量的影响方向不同：父亲估计返还金额与男孩的估计返还数量之间呈 J 型曲线关系；而母亲估计返还金额与男孩的估计返还数量之间呈倒 U 型曲线关系。

4 讨论

4.1 儿童与父母的人际信任水平

经典的信任博弈中送出金额反映了信任者的信任水平，被信任者返还金额反映被信任者的可信赖性。本研究对信任博弈进行了修改，重点考察被试作为信任者角色面对陌生人送出物品或金钱的数量，以及预期对方会返还物品或金钱的数量。其中，送出数量仍反映被试的信任水平，而这里的估计返还数量代表了被试对陌生人可信赖性的预期：若被试认为对方可信，则会估计对方返还较多数量的物品或金钱；若对方不可信，则预期对方为追求利益，而不会返还或返还甚少。有研究者(Cox, 2004)指出投资博弈中的送出金额并不单纯测量了信任水平，其中还包括了利他偏好成分。因此，相比较而言，估计返还数量可能是衡量人际信任的更可靠指标(陈叶烽，叶航，汪丁丁，2010)。所以，本研究同时采用了“送出数量/金额”和“估计返还数量/金额”两个指标测量被试的信任水平，并比较了两个指标得分的异同。研究结果显示，儿童被试两指标之间呈现 0.60-0.70 的中等相关，成人被试信任的两个指标间的相关在 0.60 至 0.90，说明两指标的一致性较高。同时，研究结果还显示，父亲送出金额显著低于估计返还金额，这也说明“送出”和“估计返还”金额测量的可能不完全是同一种倾向，“估计返还金额”可能更准确、有效地测量了被试的信任水平。

本研究中，儿童被试平均送出其巧克力的 62%，其送出数量和估计返还数量的比值为 1:0.94，与其他儿童信任博弈实验结果基本一致(郑璞等，2010)。

父亲平均送出其资金的 52%，母亲送出 54%，这也与以往成人信任博弈实验结果类似(Cox, 2004)。这说明无论采用实验还是问卷形式呈现投资博弈任务，被试表现出的信任水平相似。此外，本研究对父亲和母亲送出金额、估计返还金额的比较分析表明，父亲估计返还的金额显著高于其送出金额，而母亲则未表现出这种差异。前文曾指出送出金额在反映被试信任水平的同时，可能也掺杂了被试的利他偏好，而估计返还金额则测量了较为纯净的信任水平。所以，这一结果可能显示了父亲在信任博弈中较好地区分了利他偏好和人际信任。有关信任博弈性别差异的研究发现，男性在博弈中的信任表现更多是基于博弈情景做出的，而不受利他偏好影响；与之不同，女性的信任更多是受利他动机驱动的(陈叶烽等，2010; Ashraf, Bohnet, & Piankov, 2003)。因此，父亲在两个信任变量上的得分差异、母亲得分的无差异均印证了两变量测量内容上的不同。

4.2 信任水平的代内相似及代际传递现象

研究发现女孩父母无论是送出还是估计返还金额都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男孩父母的信任水平相似性稍差，尤其在估计返还金额上无显著相关。Dohmen 等人(2009)对德国被试的研究显示家庭中夫妻的信任水平相似性较高，与本研究女孩父母的结果基本一致；但他们的研究中没有考察子女性别是否影响相似程度，因此无法与本研究结果进行直接比较。但本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家庭代内价值观相似的观点(Bisin & Verdier, 2000)。本研究中男孩和女孩父母的年龄、受教育水平、职业等人口统计学指标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基本可以排除取样出现男孩和女孩家庭不可比的情况。但该结果是否揭示了一个真实的规律还需其他同类研究来检验，更需要寻找进化心理学的论据来说明子女性别与父母观念相似程度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信任存在代际传递现象，但是子女性别和信任的测量指标影响代际传递。首先，测量

指标的影响表现在估计返还数量/金额的预测效果优于送出数量/金额。两指标的差异上文已做分析,在这里不再赘述。由于估计返还数量被认为是更纯净的信任测量指标(陈叶烽等, 2010), 所以可以认为父母的信任水平能够预测儿子的信任水平。子女性别对信任代际传递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父母的信任水平不能预测女孩信任水平, 而男孩父母的信任水平却表现出对子女的显著影响。这一结果可能与不同性别儿童特点和父母期望不同有关。一方面, 男孩和女孩不同特点导致父母对他们的教育行为也表现出差异。有关儿童青少年问题行为的研究结果都一致表明男孩的攻击、破坏、违纪等问题行为显著多于女孩 (Bradshaw, Schaeffer, Petras, & Ialongo, 2010), 因此男孩父母会更多地对子女强调风险、安全、信任等问题, 父母有关他人、环境可信性的观念便经由这些教育行为传递给子女。与之相反, 女孩的问题行为较少, 其父母这方面的观念则较少直接传递给她们, 因此可能使男孩父母和女孩父母信任水平的代际传递表现出差异。Zumbuehl 等人(2012)的研究也发现父母花费较多时间与子女沟通, 尤其是有关风险、信任的沟通会增强这些观念的代际传递效应。另一方面, 家庭对男孩和女孩期望不同可能也会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投入, 从而影响代际传递效应。由于男孩更多被认为是家庭未来的接班人, 因此父母对男孩成长更为关注, 其自身的态度和价值观也更多地传递给男孩, 从而表现出较强的代际传递 (Zumbuehl et al., 2012)。父母对女孩没有这种期望因此对女孩发展的控制性相对较低, 表现出的代际传递也相对较弱。在我国, 无论是家庭财产分配、继承还是婚嫁传统、姓氏传统都表现出将儿子看作原生家庭的接班人, 而视女儿的未来与原生家庭无关(被嫁出)。这也就决定了父母对儿子期望高于女儿的传统 (黄光国, 胡先缙, 2005), 所以会出现更为突出的子女性别对父母关注度和教育的影响。这可能是男孩家庭表现出信任的代际传递, 而女孩家庭没有的原因之一。

4.3 信任代际传递中父母影响的差别

本研究在探讨信任的代际传递过程中发现父亲和母亲对儿子信任水平的影响模式不同。父亲对儿子的影响呈 J 型曲线: 当父亲表现出一定信任时, 儿子几乎以几何倍数放大了父亲的信任水平。母亲与儿子的信任水平呈倒 U 型曲线关系: 母亲信任水平处于中等水平时, 其儿子的信任水平最高。以往有关信任代际传递的研究大都得出父母信任水平

线性预测子女信任水平的结论。例如, Katz 和 Rotter (1969) 的研究以大学生子女及其父母为被试, 其结果中隐含了父亲信任水平线性预测儿子信任水平的结论; Dohmen 等人(2009)以成年子女及其父母为被试的研究采用回归方程揭示了父亲与子女信任水平之间的线性关系。本研究得到的亲代和子代信任水平的非线性关系可能与父亲和母亲在儿子成长过程中的角色不同有关。在男孩的成长中, 父亲是其产生性别和角色认同的榜样, 因此男孩在摆脱了俄狄浦斯情结后会通过模仿甚至放大父亲的行为、态度表现出对父亲的认同。本研究中儿童被试年龄较小可能在性别认同过程中刻意放大父亲的信任态度, 而表现出 J 型曲线模式。在子女成年之前, 母亲在家庭中更多担当子女的照料者角色。为了保证子女安全, 母亲对环境和陌生人会保持更高的警惕性, 这一点已经被进化心理学的研究所证实。年龄较小的未成年子女对母亲的态度、行为较敏感, 因此, 母亲对环境和陌生人的过度信任和过度谨慎都会传递给孩子不安全感 (Szapocznik et al., 1989), 只有中等程度的信任才让孩子更安心地探索环境与他人交往, 发展出较高信任水平。所以, 在本研究中表现出母亲的信任水平过高或过低, 其小学阶段的儿子的信任水平都较低; 只有当母亲的信任水平为中等程度, 男孩的信任才最高。

本研究结果与 Dohmen 等人(2009, 2012)所发现的父母信任水平能够线性预测子女信任的结果不同, 我们认为两研究结果的差异源于各自被试的年龄段不同。Dohmen 等人(2009)的研究中子女为成年人(年龄均在 18 岁以上), 其信任水平已经处于相对平稳状态, 其与父母信任水平的关系状况有可能与未成年子女与父母信任水平的关系不同。

综上所述, 本研究首次采用实证研究证实了在中国文化背景中也存在信任的代际传递现象, 且发现这种传递受子女性别和父母角色的影响: 男孩家庭中信任的代际传递现象比女孩家庭更明显; 父亲和母亲在信任的代际传递过程中作用不同。对子女性别的区分为信任代际传递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而对父母角色差异的分析则提示目前的代际传递研究相对忽略了父亲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 (Amato & Cheadle, 2005), 并为今后研究设计的改进提出实证依据。本研究仅考察了小学儿童家庭中信任的代际传递现象, 传递现象和父母对子女信任水平的预测模式可能会因子女年龄不同而发生变化, 因此有必要扩展子女被试的年龄范围对该问题

作全面描述。此外,在证实了信任存在代际传递这一事实之后,今后的研究应该着重探讨信任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实现代际传递的:是经由家庭中的价值观熏染,父母的教养行为影响,亲子沟通抑或是其他因素的作用。对信任代际传递机制或影响因素的考察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男孩和女孩家庭表现出不同的信任代际传递模式。

5 结论

本研究以问卷形式呈现投资博弈任务,以送出数量和估计返还数量作为信任的测量指标检验了116个家庭中的父亲、母亲、儿童的信任水平,得到如下结论:

(1)父母及子女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信任,且父亲和母亲的信任水平表现出相似性;

(2)在估计返还数量上,信任表现出代际传递现象,但传递因子性别不同而表现出差异:父母的信任水平不能预测女儿的信任水平;而男孩家庭中却表现出信任的代际传递;

(3)男孩家庭中,父亲和母亲对儿子信任水平的预测表现出不同模式:父亲对儿子的影响呈J型曲线,母亲与儿子的信任水平呈倒U型曲线关系。

参 考 文 献

- Amato, P. R., & Cheadle, J. (2005). The long reach of divorce: Divorce and child well-being across three generation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7, 191–206.
- Ashraf, N., Bohnet, I., & Piankov, N. (2003). Is trust a bad investment.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s Series. Retrieved May 18, 2009, from http://www.hertig.ethz.ch/LE_2004_files/Papers/Bohnet_Trust_Bad_Investment.pdf
- Ben-Ner, A., & Halldorsson, F. (2010). Trusting and trustworthiness: What are they, how to measure them, and what affects them.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1, 64–79.
- Bisin, A., & Verdier, T. (2000). Beyond the melting pot: Cultural transmission, marriage, and the evolution of ethnic and religious trai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 955–988.
- Bradshaw, C. P., Schaeffer, C. M., Petras, H., & Ialongo, N. (2010). Predicting negative life outcomes from early aggressive-disruptive behavior trajectories: Gender differences in maladaptation across life domain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9, 953–966.
- Burks, S. V., Carpenter, J. P., & Verhoogen, E. (2003). Playing both roles in the trust gam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51, 195–216.
- Calderon, C., Chong, A., & Galindo, A. (2002). Development and efficiency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and links with trust: Cross-country evid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1(1), 189–204.
- Chen, Y. F., Ye, H., & Wang, D. D. (2010). Measuring trust level and its impact on cooperation. *Management World*, (4), 54–64.
- [陈叶烽, 叶航, 汪丁丁. (2010). 信任水平的测度及其对合作的影响. *管理世界*, (4), 54–64.]
- Chiappori, P. A., & Reny, P. (2006). *Matching to share risk*. Working Paper, Columbia University.
- Corriveau, K. H., Harris, P. L., Meins, E., Fernyhough, C., Arnott, B., Elliott, L., ... de Rosnay, M. (2009). Young children's trust in their mother's claims: Longitudinal links with attachment security in infancy. *Child Development*, 80, 750–761.
- Cox, J. C. (2004). How to identify trust and reciprocity.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46, 260–281.
- Dean, S. K. (2005). Using experimental economics to measure social capital and predict financial decis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 1688–1699.
- Dohmen, T., Falk, A., Huffman, D., & Sunde, U. (2009).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attitude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7(1), 8–12.
- Dohmen, T., Falk, A., Huffman, D., & Sunde, U. (2012).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risk and trust attitud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9, 645–677.
- Fukuyama, F. (2001).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Z. H. Peng, Trans.). Haikou: Hainan Press.
- [福山. (2001). *信任: 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彭志华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 Huang, G. G., & Hu, X. J. (2005). *Face: Power Game of Chinese People*.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黄光国, 胡先缙. (2005). *面子: 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Katz, H. A., & Rotter, J. B. (1969). Interpersonal trust score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Child Development*, 40, 657–661.
- Knack, S., & Keefer, P. (1997).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 1251–1288.
- Li, H. L., & Chang, L. (2007). Paternal harsh parenting in relation to paternal versus child characteristic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aternal resemblance belief.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39, 495–501.
- Ma, D. Y. (2008). Trust, origins of social trust, and its transitions in mainland China. *Open Times*, (4), 72–84.
- [马得勇. (2008). 信任、信任的起源与信任的变迁. *开放时代*, (4), 72–84.]
- Niemi, R. G., Katz, R. S., & Newman, D. (1980). Reconstructing past partisanship: The failure of the party identification recall ques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4, 633–651.
- Rotenberg, K. J. (1995). The socialization of trust: Parents' and children's interpersonal tru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18, 713–726.
- Szapocznik, J., Rio, A., Murray, E., Cohen, R., Scopetta, M., Rivas-vazquez, A., ... Kurtines, W. (1989). Structural family versus psychodynamic child therapy for problematic Hispanic boy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7, 571–578.
- Uslaner, E. M. (2006).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 (D. M. Zhang, Tran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尤斯拉纳. (2006). *信任的道德基础* (张敦敏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Xin, Z. Q., & Zhou, Z. (2012). A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of changes i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trust.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 344–353.
- [辛自强, 周正. (2012). 大学生人际信任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20, 344–353.]
- Zheng, P., Yu, G. L., & Zheng, Y. F. (2010).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trust in economic game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26, 378–383.
- [郑璞, 俞国良, 郑友富. (2010). 经济博弈中儿童信任的发展. *心理发展与教育*, 26, 378–383.]
- Zumbuehl, M., Dohmen, T., & Pfann, G. (2012). Parental investment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conomic preferences. Retrieved July 23, 2012, from <http://www.eea-esem.com/eea-esem/2012/m/viewpaper.asp?pid=796>

Trust: Parents' Similarity and Parent-Child Transmissibility

CHI Liping

(School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China Women's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o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found that parents could transmit some of their characteristics, values and behaviors to their children. Some researchers concluded that the level of parent's interpersonal trust might correlate to that of their child, that is, there exists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interpersonal trust.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found evidence for the conclusion or hypothesis. Recently, a study conducted in Germany found that father and mother had the similar level of trust and this positive assortative mating reinforced the impact of parents on children. By now, no empirical research has been done in China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of father's and mother's trust level,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us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nvestigate how parents' trust correlate to each other and predict their child's trust. Research in this aspect may shed light on the family origins of people's interpersonal trust.

Based on a Chinese sample of 116 parents-child pairs,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examine whether there was significant similarity of father's and mother's interpersonal trust in the same family, and whether parents' trust could be transmitted to their children or not. The study collected participants' responses to trust game presented in a questionnaire so as to measure their interpersonal trust. Each child participant was asked to decide how many chocolates would he or she like to send a strange child and to guess how many chocolates would the strange child return to him or her after receiving participant's chocolates. Each parent participant was also asked the similar questions, except that what being sent and returned were not chocolates but money. Both the numbers of chocolates the child participant sending and estimating to be returned were the indices of interpersonal trust. In the same way, both the amounts of money the parent participant sending and estimating to be returned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interpersonal tru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children and their fathers and mothers exhibited trust to some extent in the investment game. (2)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s of father's and mother's interpersonal trust (i.e., a kind of intragenerational similarity), except that the estimated amounts of being returned of boys' fathers and mothers were not correlated. (3) Gender of the child impacted on the strength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Parents' trust could not predict daughter's trust; whereas they did for sons. The transmission patterns of father and mother were different: the relationship of father's and son's trust levels fit a positive quadratic model but data of mother's and son's trust fit a negative quadratic model. The present study has potentially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s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it sheds light on the basic question of where trust comes from.

Key words trust; intragenerational similarity;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investment game